

岭南



文献史

◎ 乔好勤 / 主编



广州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第12次
资助社会科学出版项目

文献，是人类智慧的结晶，是人类文明的产物；

文献，是社会发展的记录，是地区、民族、群体兴衰的反映；

文献，是人类最伟大的创造，是超越时空无声的见证。

因此，流逝的岁月，谁也不能把它抹去。



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
<http://www.hustp.com>



第一 广州

合会
出版项目

岭南

文

献

史



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

<http://www.hustp.com>

中国·武汉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岭南文献史/乔好勤 主编. —武汉: 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 2011. 6
ISBN 978-7-5609-6785-1

I. 岭… II. 乔… III. 文献学-图书史-研究-广东省 IV. G25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236773 号

岭南文献史

乔好勤 主编

策划编辑: 刘 平 (liup@hustp.com)

责任编辑: 刘 平

封面设计: 刘 卉

责任校对: 朱 玢

责任监印: 周治超

出版发行: 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中国·武汉)

武昌喻家山 邮编: 430074 电话: (027)87557437

录 排: 武汉众欣图文照排

印 刷: 湖北新华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10mm×1000mm 1/16

印 张: 34.75 插页: 2

字 数: 618 千字

版 次: 2011 年 6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128.00 元



华中出版

本书若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向出版社营销中心调换
全国免费服务热线: 400-6679-118 竭诚为您服务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作者 简介

作者简介



乔好勤，教授，字遂之，笔名于杞、穆瀚、舒岩，河南杞县人。1942年9月5日生。1966年毕业于武汉大学图书馆学专业，曾任职河南省图书馆。1981年获武汉大学文学硕士学位，留校任教。1988—1995年任图书情报学院副院长、《图书情报知识》主编等。1995年调华南师范大学，任图书馆馆长兼信息管理学系主任、图书情报研究所所长。2004年3月—2009年8月任广东岭南职业技术学院图书馆馆长。先后担任中国图书馆学会学术委员会委员、教育与培训组副组长、期刊研究组副组长，广东省图书馆学会学术委员会主任、资深专家委员会主任及广东省高校图工委副主任等。出版学术专著与合著15种，发表论文140多篇。曾获广东图书馆学会“杰出贡献奖”。

序

□□□ □ □ □

近日，摆在我案头有一部书稿，名为《岭南文献史》。这部书稿相当吸引我的眼球，故情不自禁地多次翻读其中篇章，感到当代有关岭南人、地、事都出了不少专著，唯独文献这一专题的研究，尚待开发和缺乏深度研究。我是土生土长的岭南人，自小听闻邻里街坊老人讲述地方风物和趣事，早如“伦文叙头大如斗，才思敏捷”，近如“刘永福打番鬼仔，越打越好睇”，连“陆云廷睇相”也听得津津有味。这种自小潜移默化感知的信息，深深地印在脑海里挥之不去。后来由于我长期从事文献整理和研究，尤其对地方文献情有独钟，因此，对岭南文献产生了兴趣，积累了一些资料，虽然十年前出版过一部《广东文献综录》，那只是为研究作基础的资料性工作，总想在有生之年，写一部有关岭南文献的著作，只因年纪增大，缺乏有效资源，只好搁置。今阅此书稿，心中充满惆怅、憧憬和欣慰之情。自感我写与他人写都一样，只要能反映岭南文化光辉的一页，为当代岭南文库增添绚丽多彩、凝重多姿的篇章，就是件好事。

是书在梳理岭南文献历史发展源流方面颇有建树。因此，我个人认为：历史，是人类进化的演绎，是社会基因的密码；历史，又常常耐心地潜伏，等待人们去发掘；历史，作为人类社会活动和自然界变化的真实历程，或多或少会留下一些痕迹。文献，是人类智慧的结晶，是人类文明的产物；文献，是社会发展的记录，是地区、民族、群体兴衰的反映；文献，是人类最伟大的创造，是超越时空无声的见证。因此，流逝的岁月，谁也不能把它抹去。回眸历史文献，不论古今中外，既有欣慰，又有惋惜。欣慰是代代有人终身守护，使文献得以长留人间；惋惜是天灾人祸，使文献命途多舛。记得曾有人说：亡其国，先亡其历史。换言之，亡其文化，先亡其文献。可见，历史文献在一个国家和地区的地位与作用。国有国家文献，族有民族文献，区有本土文献，地方文献是国家文献和民族文献的根基。

检阅该书，不难发现，这是一本区域性文献史书，她以历史年代为



经，地区事物为纬，聚岭南历代学术研究、代表人物和文献篇章于一体，其特点主要反映在三个方面。

一、岭南并非“文化沙漠”。由于岭南较中原开发稍晚，常被人误认为“文教不昌”的文化沙漠。其实，岭南的学术研究，并不比中原差，只是规模和数量有差距而已。考岭南学术最早发端于粤西封川，由两汉至南北朝，岭南各种学术文化的发展以及人才多聚集于封川，犹如秦和西汉均集中在西安至关中地区一样。封川为汉代苍梧郡治的广信，出了倡导春秋左氏之学的“三陈”和“四士”，他们是岭南学风的开拓者，有较大的引导作用。后来，印度佛学传入我国，是由水路沿中南半岛经安南或广州而传于苍梧郡，封川人牟融是用中文阐述佛学的第一人，时人还抨击他“背五经而向异道”，为此，他作《理惑论》作答辩。唐代有新兴人六祖慧能继承传法，更为发扬，影响深远。因此，经学和佛学，以岭南研究为最早的发源地之一。而儒家学说的研究，唐代以粤北张九龄、刘瞻、刘轲、余靖为杰出代表。他们在经学、儒学、文学等方面的成就，在全国占有一席之地。

明清时期，岭南学术研究已由粤西、粤北转移到珠江三角洲，如新会陈献章和增城湛若水，他们师徒创造了白沙学说，其弟子唐伯元、薛侃、方献夫、杨起元、陈建、黄佐以及丘濬等，皆能师授相承，完成了理学的升华和心学的开拓，在全国独树一帜。清代在朴学大师阮元的指导下，改变了广东不重视考据的学风，因而创立学海堂，培养了陈澧、朱次琦等一批学者，东塾门徒多英伟之士，对岭学与朴学的结合，贡献颇大。因此，岭南学术研究，发端于粤西，完成于粤北，繁荣于珠江三角洲。学术研究必然产生文献成果，有谓“文以载道，献以传贤”。此皆岭南学术和文献发展的概况。

二、岭南文献鲜为人知。岭南因处五岭之南，古代深受崇山峻岭之阻隔而疏远与中原的交往。秦汉以降，进入岭南腹地只有三条路线：一为水路，即由长安出汉中，沿汉水而下，过长江经洞庭湖，溯湘江而转入漓江，达苍梧顺西江而至广州，封川为岭南学术发源地，与此有关；二为陆路，由河南洛阳南下，辗转鄱阳湖，溯赣江而至赣南，跨越南雄梅关，再由浈水汇入北江而至广州，此亦粤北继粤西为学术中心的缘由；三为海路，即由洛阳或开封南下，渡长江而至太湖，由浙江沿海经福建而至潮汕，再扩展至珠江三角洲。由于上述历史地理的原因，造成岭南与中原的阻隔，影响学术与文献的交流。这种本土文化虽然全国都普遍存在，但岭南更为突出。以清修《四库全书》为例，该书收录图书 3461 种，存目 6793



种，合共 10254 种，计 172860 余卷，是举世瞩目的“百科全书”，但粤人著作却寥寥无几，有也是唐、明间几位名家的著作，反映不了岭南文献的全貌。像这种现象，至今仍然存在，如地方艺文、族谱与藏书家等。正如谚语说：“北人不识番禺，南人不识整屋”。

三、岭南是中西文化融合碰撞的交汇点。广东为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与终点，古代陆路交通很不发达，但海上交通贸易却占有绝对优势，全省拥有大陆海岸线长 3368.1 公里，海洋岛屿岸长 3460.8 公里，有大小岛屿 1431 个，港湾 153 处，在古代以帆船作为交通工具的时代，岭南无疑成为中外贸易与文化交流的窗口。自两汉以来，印度佛教和阿拉伯伊斯兰教先后传入广州，明清时期，西方传教士又传来了基督教（天主教、东正教和新教），他们带来了西方的自然科学、科学仪器以及欧洲的绘画、塑像和建筑艺术等，扩大了国人的视野，增长了知识，并学到了多种外国语言文字。所以，岭南人民及有识之士，对西方科学、文化和印刷术加以吸收和改进，在近代岭南产生了中国最早的留学生，最多的外交家，最早的西医和医院，最早的新闻报刊，最早的科技人才，最早的西方印刷术和最早的资产阶级革命家、改革家和企业家，并产生了一批具有中西文化融合的文献，如铅印本、石印本、影印本、机器版、电子版以及中西文合璧本等，颇具特色。

乔好勤教授与我同为武汉大学校友，我俩虽时有先后，但均为目录学中同仁。他学有专攻，著述颇丰，是我国的图书馆学、目录学、文献学家。以他一个外省人士来粤工作十几年，能为此书广集资料，条分缕析，梳理岭南文献历史发展的脉络，缘于他的信念、勤奋与毅力所得的结果，诚非易事。乔书既成，问序于余，谨弃数言，为我同行者倡，聊存赘言。

骆 伟

书于中山大学蒲园

2010 年 1 月 26 日

目录



第一章 绪论 /1

- 一、地方文献的范围及其界定原则 /1
- 二、地方人士著述是否地方文献 /11
- 三、流寓名人著述的地方文献价值 /18

第二章 秦汉：岭南文献的发轫 /29

- 一、岭南文献溯源 /29
- 二、岭南儒学的兴起及其著述 /40
- 三、杨孚《南裔异物志》的开创性贡献 /43
- 四、《临海水土记》非杨孚撰 /46
- 五、牟子，佛教中国化的先驱 /50

第三章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岭南文献 /56

- 一、士氏经注与虞氏易学：岭南儒学研究的第一个高潮 /56
- 二、岭南方物文献 /60
- 三、岭南史地文献 /63
- 四、《抱朴子》与岭南道教文献 /68
- 五、佛经的翻译与著述 /77
- 六、岭南文学的萌芽 /80

第四章 隋唐五代时期的岭南文献 /86

- 一、岭南文化的发展与岭南文献 /86
- 二、儒学及其著述 /90
- 三、文学艺术作品 /97
- 四、史地方物文献 /106



- 五、宦游名家著述 /112
- 六、岭南禅宗顿教及其典籍 /121
- 七、道教与道教文献 /131

第五章 宋元时期的岭南文献 /141

- 一、宋元时期岭南政治经济与文化 /141
- 二、宋元时期思想与著述 /143
- 三、入粤名人的学术著作 /159
- 四、朱熹及其潮籍门人的著述 /163
- 五、文学艺术著作 /167
- 六、史地方志著述 /188
- 七、岭南科技医学著述 /196
- 八、岭南风物著述 /201
- 九、岭南宗教典籍 /203

第六章 明代的岭南文献 /209

- 一、经济繁荣与文化的发展 /209
- 二、岭南出版发行与藏书事业 /211
- 三、江门学派及其著述 /213
- 四、岭南教育和科学技术的发展与图书 /217
- 五、西学东渐与岭南文献 /219
- 六、《广东通志》的编纂及其他 /223
- 七、南园诗社与诗集 /226

第七章 清代前中期的岭南文献 /234

- 一、社会变革与岭南文献的发展 /234
- 二、岭南史著与方志编纂 /239
- 三、说粤书与农书 /244
- 四、岭南文坛与文学作品 /249
- 五、岭南朴学及其著述 /254
- 六、岭南书院的繁荣与图书出版 /255
- 七、外来文化与岭南图书 /259



第八章 清代后期的岭南文献 /265

- 一、鸦片战争前后岭南的西学西书 /265
- 二、太平天国革命运动及其文献 /273
- 三、西学东渐与岭南新学启蒙读物 /275
- 四、康有为、梁启超及康门弟子的著述 /282
- 五、朴学的复兴与著述 /299
- 六、清代后期的岭南文学著作 /325
- 七、文献整理与图书出版 /365
- 八、清代后期岭南的藏书 /398

第九章 民国时期的岭南文献 /422

- 一、民主革命斗争与孙中山等人的著述 /422
- 二、马克思主义及共产党书籍在岭南的传播 /438
- 三、社会科学研究与著述 /448
- 四、史地研究与著述 /471
- 五、文化教育研究与著述 /482
- 六、文学艺术创作与研究著述 /486
- 七、科技文献与医学著述 /507
- 八、文献收藏、整理与出版 /524

后记 /544

第一章

绪论

一、地方文献的范围及其界定原则

中国很早就有了地方文献。孔子曾“使子夏等十四人求周史记，得百二十国宝书。”《周礼》上说：“小史掌邦国之志”，“外史掌四方之志”。可见春秋时期各地都有自己的史志，号称“百国春秋”。孔子西观周室藏书，问礼老子，周游列国。“删《诗》述《书》，定《礼》理《乐》”，据《鲁史》而著《春秋》，所得郡国地方文献肯定不少，但仍感到地方史料的缺乏。“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徵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徵也。文献不足故也。”这是我国史籍中最早提到“文献”一词，并且指的是地方文献。2500年前的孔子已深感地方文献的缺失，使他无法整理说明如杞、宋这些地方郡国的典章制度。

今天，随着科学文化和经济发展的需要，人们对地方文献的搜集整理更加重视。开发利用地方文献，建立地方文献资源库的呼声一浪高过一浪。但是，什么是地方文献？地方文献的收藏范围怎样？在对这些基本理论的认识上，至今没有一个明确的、便于掌握和操作的界定标准。我过去对此关心无多，近日因工作需要才去拜读专家们的大作。但是越读越感到分歧很大，表达也相当混乱。理论认识是工作实践的指导，“义例”不明，岂能不自乱体例？所以，这里首先对各专家的意见进行梳理，然后取诸家之长，联系地方文献工作的现实和实践，从广义论者的观点出发，提出界定地方文献的五个原则。

1. 关于地方文献收藏范围的几种不同认识

1957年3月至5月，文化部社会文化事业管理局和北京图书馆等六家单位举办了“省市图书馆工作人员进修班”，杜定友先生讲授了《地方文献的搜集整理和利用》。他开宗明义说：“地方文献是指有关本地方的一切资料。”接着第一部分就是“地方文献的范围”。他说：



地方文献应包括三个部分：史料、人物、出版。

“史料”是关于本地方的一切情况的记载。“人物”是指关于本地方知名人士、劳模、烈士以及与本地方建设有关的各地方重要人士(寓贤)，他们的照片、著作、手迹、传记、纪念文字等都在收藏之列。他还指出：“采集以历史人物为主，近代人物以知名人士为限”，“关于个人作品则全部收罗”。“出版”主要指本地方刻的古书，“近代出版物则以本地方机关团体编印的为限。翻本和对于本地方没有直接关系的可不收。”^[1]

1979年在中国图书馆学会成立暨第一次学术研讨会上，于乃义先生提出：

地方文献范畴应包括文物、图书、资料三项，

而图书一项，可分为十类。但他对这三项未作更多的阐释。^[2]同年，高树榆先生提出：“所谓地方文献，必须同时具备地方性和文献资料性。”地方性，即“某一地的文献资料必须是与某一特定地方有关”；文献资料性，即“必须是具有历史价值的图书文物资料”。他说：

按照这一原则，本人认为下列三方面属于地方文献，即：地方出版物、

地方人士著作、论及地方的著述。

他毫不含糊地指出：“凡某一地方历代出版机构、其他机构以及私人的出版物，均属于地方文献。”“地方人士包括原籍为该地的，也包括原籍虽不在该地但曾在该地任职、居住，并有相当影响的人。他们的著作应包括文集、专著、论文、诗词、信札、日记、奏折等。”“凡论及某一地方的著作、专文；散见在书刊上的文章、图片；以及某些书刊中的有关章节、段落都应属于这个范围。”^[3]这一提法显然与杜定友先生的“知名人士”、“重要人士”及“刻本”、“直接有关”的表述不同，范围更广。

1982年武汉大学、北京大学编写组出版的《目录学概论》指出：

地方文献一般说，包括地方史料、地方人士著作、地方出版物。

这是新中国建立以后提出的经典式的地方文献三项说。该书进一步提出判断三项地方文献的原则为：

地方史料取决于著作内容的地方特点；地方人士著作取决于作者的籍贯；地方出版物取决于著作的雕印、出版的地点。

这些观点无疑是非常正确的，也受到不少学者的赞同和引用。但是，该书接下去关于“地方人士著作”却说：

“地方人士著作中只有内容带有地方特点的一切著作才是地方书目收录的范围。”“地方人士著作中内容不带有地方特点的，不必收录到地方文献书目内。”“地方人士传记收录在何地地方文献书目内，不按本人籍贯，而是列



人与本人生平活动有重大关系地区的地方文献书目。”

关于地方出版物，该书也说：

其内容与本地无关，可不必收录于地方文献书目，只有内容涉及一地……列入地方文献书目内才有价值。

既然地方人士著作和地方出版物只有内容涉及本地方的，才列入本地方文献，那么这些著作就符合了第一个标准（内容标准），第二及第三个标准就毫无意义。既然“地方人士著作取决于作者的籍贯；地方出版物取决于雕印、出版的地点”，为什么又“不按本人籍贯”，而又只看其“内容”是否带有地方特色？既然地方出版物也强调“内容涉及一地”，而又说“有助于说明一地雕刻出版特色的那些书刊”却要列入地方文献？^[4]

1988年以后骆伟先生先后发表了一批地方文献方面的论文，其中1988年发表于《广东图书馆学刊》上的《论地方文献》是其代表作，全面阐述了他关于地方文献的概念、地方文献的范围及地方文献工作中若干问题的观点。^[5]直到17年后的2005年他的观点并没有改变。^[6]他说：

地方文献是反映特定区域内的一切自然现象和社会现象以及群体活动方式的记录，凡在内容上涉及该区域并具有一定价值的软文化，均属于地方文献。

他所说的“软文化”，指“人类通过各种斗争和智慧所创造的精神产品”。该文对杜定友先生的观点显然持批评的态度。他说：“有人认为地方文献是指有关某一区域的一切文献，这个‘有关’是指内容有关，还是形式有关？抑或两者皆有？而‘一切’显然含有史料应用价值的文献，也包括没有史料应用价值的文献，我认为这一观点没有抓住地方文献的特点，显得含混，概念不清。”骆先生接着指出：“为了使地方文献概念具体化，还需要进一步明确地方文献的范围。划定事物的范围，关键的一点是要确定标准，这一标准既要考虑科学研究的目的，又要考虑实践工作便于掌握。”这些建议无疑是非常正确的。但是，接下去他一方面认为，

地方文献的范围，应包括下列三个方面：区域事物；区域人物；区域出版物，

另一方面又认为，

只要“有关一个地区的历史与现代的重要人物”的“传记、事迹、照片、录音、录像等，都属于地方文献”。“至于地区人物的著述，是否可收入地方文献？我认为应以是否反映该地区的事物作为划分的标准。”“我们对待一切著述，应紧紧围绕地方内容这一要点而决定取舍，这是一个明确的界限。”

既然“一切著述，应紧紧围绕地方内容”为取舍，给地方文献设立“区



域人物著述”、“区域出版物”两方面就是多余的。实际上，骆先生判断地方文献范围的标准只有一个，即“地方内容”。但是，他在论述“区域出版物”时，又强调“地方出版物，是反映一个地区文化水准的标志之一”，“区域出版物之所以作为地方文献，主要是从文献角度去考虑的，因区域出版物从内容到形式，都或多或少反映地方的特点。”后来他在《论岭南文献》一文中把岭南文献分成岭南人才和著述、岭南史料和岭南出版物三部分，并且指出：“上述三部分，人才与著述，是岭南文献的主体，史料是源泉和依据，而出版则为条件，三者各不相同而又紧密联系，构成了岭南文献的整体。”^[7]在这里，对于岭南人士著作，他不再强调“地方内容”，只突出这些历史人物的“光辉业绩”、“民主精神”、“维新思想”、“科学成就”，都“凝聚在文献之中”，并且指出：“岭南文献首先应指以人为中心的文献，舍人便无谈文献。”对于“岭南出版物”，作者也没有再强调出版物的“地方内容”，而只强调岭南出版业的发展，“广版”的声誉，印刷技术的精湛。

针对地方人士著作的复杂性和观点的混乱，1998年倪俊明同志发表了专论地方人士著述的文章。^[8]他明确表示：

“地方文献是否应该包括地方人士著述，我认为，回答是肯定的。”“地方文献的定义仅强调内容上的区域性，欠全面。”“因为一种文献的地方特征，既可从内容体现，也同样能从著者、出版地反映。”

他指出：

大量地方人士著述内容描述的对象可能并非特定的区域，但由于著者本人的地方属性，因而其著述自然而然地带有地方的特色，并构成特定区域文化史或学术史的有机组成部分。

针对狭义论者只重视区域人物的传记资料的观点，他指出：“研究区域人物最重要、最原始的资料，并不是他们的传记或年谱，而是他们的著述。”他进一步分析认为，地方人士著述的搜集不能厚古而薄今。古今是相对的，随着时间推移，“今”也将成为“古”。还说：“以知名度做为地方人士著述取舍的标准，也不无片面。”因为许多有价值的史料是“无名小辈”写下的。而今日之“无名小辈”，将来也可能是“名人”。倪俊明同志长期从事地方文献的搜集、整理与利用，这些论述出自于对实践的总结，十分精到，我是赞成的。但他对“祖籍和客籍的关系问题”的论述还失之笼统，在实践中不便掌握。这一点留待下文讨论。

1999年《中国图书馆学报》第一期发表了黄俊贵先生关于地方文献的文章。^[9]文章开头便说：



地方文献是记录有某一地域知识的一切载体。

这个定义得到了狭义论者的支持。他自己也说，这一提法与“某一地域为内容”或“有关本地方的一切资料”，应该是同一个意思，关键在如何去理解它们。但是，接下去的叙述却基本上是广义论的观点。他认为：

一个地域出版了什么书刊资料，拥有多少数量的登记、统计，是某一地区社会进步的综合指数的重要方面，……这些地方出版物不管其内容涉及的学科性质，均属某一地域的精神产品，是出版史料、文化志的基本材料，是地域状况研究的一个具有价值的方面，属于地方文献的有机组成的重要部分。

对于地方人士著作，他同意“对地方名人著作无论其祖籍或客籍，其内容也不论是否涉及某一地域，都应属于地方文献之列。如果扩展为地方人士著述，这就失之过滥了。”他接着指出：“将名人著作、传记及其他有关资料作为地方文献，是因为名人的业绩、成就、影响以及著作提供的知识，对于研究某一地域的历史发展具有重要意义，而不仅仅以他们的祖籍或客籍为归属。”黄俊贵先生的意思是，地方人士著作还是要选入地方文献的，不过仅限于地方名人的著述而已。对地方名人著述的选择有两个标准：一是籍，二是名。由于“籍”很复杂，“名”又难以把握，所以这一观点遭到狭义论者和广义论者两方面的质疑。

2004年金沛霖先生出版了《图书馆地方文献工作》，在其中“地方文献的范围”一节中，表示支持“在地方人士著述和地方出版物中，凡其内容不具备地域特征者，一般不应收入”的意见。对于“地方人物”，似乎不同意“以籍贯取人”。他认为：“‘籍贯’这个词所代表的那种地区的社会和文化的影响已趋减弱，以籍贯取人无法正确反映地方人物的真实面貌。”“选取地方人物的标准在于人物对本地方的影响程度。”^[10]这后面的论述似又同意以“影响程度”选取地方人物及其著述。

2004年长期从事地方文献工作实践和研究的邹华享同志再次发表文章，重申他的狭义地方文献观点。他说：“地方文献与其他类型文献的本质区别在于‘内容上具有地方特征’”，循此思路，他进一步指出：

地方文献是以内容为划分标准的，是内容上反映某一地域的自然现象和社会现象的有历史价值的图书文物资料，内容上不具备地方性的，即使是地方出版物和地方人士著述都不能视为地方文献。^[11]

作为狭义论者，他对地方文献收录范围的论述，干净利索，不拖泥带水，也无自相矛盾之处。



2. 界定地方文献的几个基本原则

关于地方文献的基本理论,特别是地方文献收录范围的讨论已有半个多世纪,其间形成的狭义论者和广义论者似有“两军对垒,各不相让”之势。但是综合论战各方的观点,分歧主要在地方人士著述和地方出版物方面。对于地方文献的地方性和资料性,认识是一致的,对于“内容涉及地方”的著述应收入地方文献这一标准大家没有分歧。问题的关键在于除了“内容的地方性”这一标准外,还有没有(要不要)其他标准?除了内容的地方性外,地方人士著述的“著述”和“作者”,地方出版物的“出版”和“形式”有没有地方性?

笔者斟酌各方的观点,根据“地方性和资料性”这一本质特点,考虑到原则(或标准)的非歧异性、图书馆地方文献工作的可操作性,提出下列几个界定地方文献的基本原则,不知是否可行。

(1) 区域性原则

地方文献工作的目的是为本地区各方面全方位的科研和发展提供文献和信息资源,所以其收藏范围首先要遵循地理区域原则。一般认为,地域范围的界定以现时地域行政区划为基础。因为只有这样才能符合各图书馆地方文献工作的目的和意义。但是“时有古今,地有沿革”,各个时代的地域区划是在不断变化的。

中国古代行政区划,基本上根据两个原则:犬牙相制原则和山川形便原则。大凡战乱岁月,北方少数民族入主中原时期,多采用犬牙相制原则划分行政区域;凡南北统一、政局趋于稳定之时,多采用山川形便原则,以利政令畅达。两汉初仍以犬牙交错原则为主,据出土的马王堆《驻军图》,粤北的连山一带属长沙国。元鼎六年设交趾部,领南海等九郡,辖今广东、广西、越南北部地区。三国孙吴以高要为分界,西江地区为苍梧郡,绥江、珠江地区为南海郡,粤北地区属荆州。西晋南北统一,山川便利原则得以充分利用,五岭开始作为一条行政界线出现。其北为荆州,其南为广州。广州辖始兴、临贺、始安、桂林等郡。东晋扩大州的范围,广州东起今福建绥安,西至今百色、南宁,横跨闽、粤、桂大片土地。

隋、唐时期的区划趋于稳定。贞观元年“因山川形便,分天下为十道”,开元二十一年又分为十五道。其中岭南道包括两广和贵州部分地区。湖州、漳州有时归江南东道,有时归岭南道。宋改道为路,岭南分广南东



路和广南西路，简称广东、广西。那时的琼、雷地区属广西，至明才划归广东。元代将“犬牙相制”原则强化到极端，广东的大部分属江西行省，广西、海南属湖广行省。^[12]至明清，各行省才基本定型。我们原则上是以今天的省市区划为基础，交叉变动地区的地方文献应依著述产生时期的地区归属，而入各地的地方文献。目前，有些地区的地方文献，既入此省，又入彼省，似显混乱。但像海南的地方人士著述和地方出版物，有时入广西，有时入广东，而海南历代文献均可收入“海南省地方文献”，这种重复又是合理的。

(2) 内容原则

当地域范围确定之后，凡在内容上涉及这一地域的文献都可以纳入这一地域的地方文献。“内容涉及某一地域”的范围是极其广泛的，包括天、地、人(古称三才)和所有学科知识领域，总之包括这个地区的一切。至于文献的类型，有人强调包括“有历史价值的图书文物资料”，这当然无可非议。但是，中国目前文化机构设施，各省市都既有图书馆，又有博物馆、档案馆，各类载体的图书、报、刊主要归图书馆收藏，而文物，特别是出土文物，恐怕就不是非图书馆莫属了。而大量的历史档案资料可能最好收藏在档案馆妥当。按照这一原则，图书馆收藏的地方文献主要是内容涉及本地的有历史价值的用文字、图像、符号、声频、视频等手段记录于各种载体的文献。这种文献主要是图书、报、刊及其电子版，不应笼统地说包括文物。至于这些著述作者是地方人士还是外来人士，是地方出版物还是外地出版物，都无关紧要。

(3) 出生地原则和户籍原则

地方人士著述是否属于地方文献，是一个长期争论的问题。争论的焦点有三：一是内容未涉及地方的地方人士著述，特别是一些理论和技術性著述是否具有地方资料性；二是著述者的籍贯是否还可以作为界定地方人士的标准，是以“籍贯”取人，还是以“影响”取人；三是“流寓”应该怎样界定。

关于第一个问题，前面提到的倪俊明同志的文章已说得比较清楚：“一种文献的地方特征，既可从内容体现，也同样能从著者、出版地反映。”“大量地方人士著述内容描述的对象可能并非特定的区域，但由于著者本人的地方属性，因而其著述自然而然地带有地方的特色，并构成特定区域文化史或学术史的有机组成部分。”又说：“从地方人物研究角度来看，